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社会思想史

——儒家思想、儒家式社会与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修订版)

[韩]宋荣培 著

国际汉学经典译丛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国际汉学经典译丛

中国社会思想史

——儒家思想、儒家式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修订版)

[韩]宋荣培 著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 大象出版社 ·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思想史：儒家思想、儒家式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 (韩) 宋荣培著. — 郑州：大象出版社，2016. 12

(国际汉学经典译丛)

ISBN 978-7-5347-8305-0

I. ①中… II. ①宋 III. ①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 IV. ①D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22121 号

中国社会思想史

——儒家思想、儒家式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修订版)

[韩]宋荣培 著

出版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耿晓谕
责任校对 牛志远 裴红燕 毛路 李婧慧
封面设计 王莉娟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文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92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新乡市获嘉县亢村镇工业园

邮政编码 453800

电话 0373-5969992 5961789

中文版序

本书原为我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读书时所撰的博士学位论文(Konfuzianismus, Konfuzianische Gesellschaft und die Sinisierung des Marxismus, v. Young-bae Song, Dissertation, Universität Frankfurt/M., 1983, 423S)。

1986年,本书最初以韩文出版时,时值戈尔巴乔夫改革宣言发表之际,当时这一事件给我的冲击至今记忆犹新。东欧与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权竟遭这般崩溃,我万万预料不到。

然而,20世纪70年代初,我时年弱冠在欧洲却体验另番景象。那是在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的欧洲知性史上抹不掉的一页。其实,如今广为谈论的“后现代主义”哲学问题全面化之前,当时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众多严重的问题已露出破绽:生产组织不断膨胀,人在城市社会中遭受排挤,严重的环境污染,核武器的威胁,等等。因此,对后期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而言,16、17世纪启蒙主义以降渐渐膨胀的“工具理性”已不再是解放人类的良方,而是破坏人与自然关系的巨大“暴力”。在部分(以法国为中心)左派知识分子看来,这种资本主义体制的社会结构,其本质上蕴含着暴力性,因而,毛泽东思想便被他们视若一种“理想的”方案以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在欧洲各国,全力支持毛泽东思想的小政党俯拾即是。

直至当时,我一直在韩国和中国的台湾,毋庸讳言,在冷战体制下产生的极端反共逻辑与牢不可破的“国安”原则中长大并接受教育,因此对于社会体制与韩国不同的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由于朝鲜战争造成的严重贫困和受害意识)所持的偏见非同一般。但另一方面,在西欧的异乡世界里,对那些精神、文化传统和我们相差甚远的欧洲人,我第一次深切体会到“文化异质感”,同时产生逆反心理,开始对当时在欧洲受热捧的“毛泽东中国革命论”产生好奇心。在欧洲自由奔放的言论与学术传统中,我重新开始学习哲学,并由此领悟到直至当时未曾察觉到的我的“真面目”(meine Identität)。虽然迟了一步,但我还是明白了我在到西欧之前苦苦追求的哲学思索实际上决非与我在其中成长并受教育的韩国社会政治问题无关。即是说,我深

切体会到我那所谓的“纯粹”哲学思绪,其实决不仅仅是“纯粹”的普遍的抽象性,而更是在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映射着我在“韩国”这个东方的落后国度里郁结的苦恼与生活。因此在我眼里,那种与具体历史空间隔阂的哲学问题,亦即,追求超历史的、普遍正确的哲学思索,突然变成了徒劳的玩笑。用不熟练的语言学习西方哲学,我极难将其接受为“普遍的”哲学,对我而言,那只不过是“西欧的”哲学而已。因此,作为一名年轻的哲学信徒,一想到祖国的割裂、第三世界问题、民族主义问题等诸如此类围绕着韩国社会的种种问题,便理应拒绝“我的哲学思索”成为“观念的、冥想的”。因此,我不可避免地为社会哲学和实践哲学所倾倒。在韩国那种保守观念横行的世界中,我曾是一名年轻的玄学者,已惯于领悟并试图在玄学上证明只有“孤立自我”的内在绝对真理的那种观念性逻辑。但,最后我对中国现代革命的问题产生极大的兴趣,甚至一度以“毛泽东主义者”自居,引发颇多的自我改变。当然,随着在韩国的另外一种生活的开始,我这种哲学的探索和转变又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

无论如何,我总是结合某个思想家或哲学家所处的具体的历史、社会条件来理解其哲学思想,这是我对哲学的根本兴趣之所在。我在探讨儒家思想的本质时,首先将人们常视如超历史的和所谓绝对真理的“新儒学的”世界观和解释,与之分离,再加以诠释。因此一开始便将朱熹的《四书集注》排除在外,主要通过对同时代的文献——尤其是《左传》《国语》等——进行概念和历史实证上的考证,以及分析孔子思想的原始资料《论语》的意蕴,同时结合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大变革的历史”而进行阐述。在此,需加声明,我对于儒家思想的研究不仅与那些传统的性理学者主张儒家思想超时代、超历史的普遍正确性不同,而且也区别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学者根据 20 世纪 50 年代斯大林所提出的被单一图形化的五个社会历史阶段划分的唯物历史观理论,以及将孔子思想判定为反动思想的观点。

“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既可谓西欧人典型的亚洲观,且可谓“马克思主义的欧洲中心主义”观。欧洲思想家将中国社会界定为“停滞性”(Stagnation),为批判这一观念,我便阐明,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由于土地所有问题和从中必然派生出来的、由于生产阶级绝对的土地不足而产生的社会结构的矛盾及其所经历的内在变化(体制变革),约以 200 年为一周期重复出现,在结构上“旧地重蹈”。我关于中国传统社会非资本主义形态的学术成就,乃是通过对 20 世纪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展开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以

及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论”和“灌溉假说”文献的广泛涉猎而形成。

如上所言,本文以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传统的社会结构作具体而彻底的理解与分析为基础,试图阐明在现代中国出现的独特的“中国革命之路”。总体上,我将中国革命理解为“脱儒家化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近现代中国漫长的历史过程。从这种观点出发,我首先探讨提出“市民社会的中国”理想并以“科学”和“民主”两大口号而否定传统儒家世界观的“新文化启蒙运动”。进而提出,在当时试图将整个中国“像非洲一样瓜分”并殖民地化且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帝国主义势力和更具有冲击性的西方文化居绝对优势的形势下,中国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是如何发展而来的这一精神史问题。然后分析现代中国在何种“紧迫的”政治社会背景下将马克思主义选择为革命指导理念的具体原因。另外,我还梳理了,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展开过程中,毛泽东革命路线实际上与斯大林的中国政策貌同实异,是对其加以克服的方案;然后主张“无限矛盾的分裂与展开”,以扬弃马克思末日论的乌托邦思想的西欧式视野,同时明确指出,在中国落后的政治经济现实中,与提高生产力这一议题相比,毛泽东思想将重点放置于生产关系的改善上,因而驱使他过度强调人的革命意志。由此我们便可发现,在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中,有意无意之间打上了那“道”的变化无穷、永无止境的中国传统道家世界观和强调人的实践伦理意志和决断力的儒家的世界观的烙印。

但是,本书讨论的不是1978年以后现代中国推动的各种产业结构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问题,而是此前中国社会“根源式的”社会变革,亦即,近现代中国社会走过的“自我变革”(或革命)过程中的问题,与维护传统的儒家思想正统性的“儒家式社会”的社会构成体的问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用通史的目光进行分析和提示。因此,如今我们目睹东欧政权崩溃、东德被西德吸收统一,以及苏联解体等最近巨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变革”之后,对众人而言,无法拭去本书已经成为另一部“古典作品”的感觉,此乃笔者坦率的心情。

但我想指出,要解决未来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就需要对中国传统思想始终采取既透彻且科学的理解。因此我认为,本书第二部中基于庞大的文献基础之上独创性地提出的“儒家式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对它所作的分析尤具深远的意义。对于此,希望能够继续进行广泛的——不管肯定的还是批判的——学术上的讨论。

坦率而言,一想到拙著即将面对数亿中国读者,我便激动不已。因为对中国历史和思想问题的思考至今为止一直是我生命中一个最本质和最重要的部分,故时常难免有不堪内疚之感并意犹未尽之情。怀着这般心情,毫无保留地将其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须是一种茫然的畏惧和腴腆,希望诸多硕学贤达不吝赐教。

拙著得以在中国著名的大象出版社出版,为即将全面展开的中国与韩国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铺路奠基,对于这一荣幸,本人深感自豪。

值此机会,向朴荣雨(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博士班)同学精心阅读原稿并进行润色,致以特别的感谢。我还要向李雪涛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为本书的出版而花费的大量精力以及不断地与大象出版社联络的张明明博士表示感谢。同时向大象出版社社长王刘纯先生欣然接受本书,使之得以面世,致以深深的谢意。最后,向大象出版社编辑部的各位职员,谨致谢忱。

2016年2月12日

宋荣培于首尔

韩文首版序

本书原名为“儒家思想、儒家式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由于本书论述的涉及范围远自孔子以前的西周直至现代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即在中国社会发展史长达三千年以上的历程中,详述其社会经济基础上的变化和结构及思想潮流的变迁——透过中国古代儒家哲学(第一部)和自汉代至清代的“儒家式社会”的结构论(第二部)以及对现代儒家思想的破坏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第三部)——因而值此次将德文译为韩文之际,将书名改为“中国社会思想史”,原书名则附为副题。其中,第一部第二章所论述的关于“孔子‘仁’思想的意义与界限”,是由一篇承蒙(韩国)文教部学术研究经费(1985年)之辅助而写成的论文《孔子“仁”思想与儒家存有论的滥觞》(《当代书籍》,1985年,冬季号)得以填补。书中的其他部分亦有所增补。

1972年5月,我时年28岁,离开台北抵达法兰克福。同年8月于图宾根(Tübingen)大学就读。我在首尔大学哲学系和哲学研究所及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读书阶段,我的学术热情主要倾注于诸如形而上学的问题、知识论问题、东西比较哲学等所谓的“纯粹”哲学领域。当时在我脑海中,诸如斯宾诺莎、老子、庄子逍遥游的世界、海德格尔之“存有”概念、儒家天命思想、胡塞尔之现象学,以及佛教唯识论等东西哲学的各种概念正如狂风大浪般涌现翻腾。我原本计划,将来转到比利时鲁汶大学,以“现象学上的知识理论与唯识论之比较”作为题目撰写博士论文。然而,在图宾根大学的研究却导致我对当时所持的哲学思想产生怀疑。之后,虽然我一度得到去鲁汶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的机会,但却在1973年年底重返图宾根。我的此番哲学“巡礼”带给我一种与其称为“确信”不如称为“怀疑”与“空虚”的后果。其理由应该是,无论何种思想都是现实社会的具体结果;同时,每一位哲学家,不管有意无意,唯有站在当时各自所面临的时代问题与其“痛楚”中,方能体认他们各自的“理性”(Vernunft)与“理想”(Ideen)所蕴含的价值。而且,我相信正是这种客观条件(历史背景)才使他们思想的生命根源得以激活生发。之所以导致此般结局,也许是由于我的哲学程度尚浅,我还不了解其生

命之根源,却急于捕捉那浮现在皮毛层面的绚烂的“概念”。当时我的挫败感严重得非比寻常。但另一方面,我开始朦胧地体会到,钻研哲学应该抱着更积极更具体的态度。我上图宾根大学哲学系博士班课程(1973—1974年)后,重新研读黑格尔哲学。当我经由科捷夫(A. Kojève)、伊波丽特(J. Hyppolite)、马尔库塞(H. Marcuse)等人的解说而得以理解黑格尔哲学之后,我便领会到黑格尔与马克思等人的哲学所蕴含的根本动机中普遍铺垫着“法国革命”的精神(Geist)。这意味着,不了解法国革命的精神,便无从掌握他们的哲学在历史层面上的意义。由于我之前一直在钻研中国古代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上述觉悟使当时(1974年)身为亚洲人的我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那便是认知现代“中国哲学”。我将中国革命理解为“脱儒家化的过程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这种认识使我对下述问题在理论层面上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即如何用批判的思想去了解那些具儒家传统的国家。为用批判态度与理性态度了解中国革命所带有的核心意义,我便在1974年10月迁移至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博士班,并且在菲琪尔(I. Fetscher)教授指导之下,绕着此议题角力奋斗,历时数年。这本书的付梓便是其成果的表现。

假设本书第一部关于中国先秦儒家哲学的研究属于一般范畴,那么第二部、第三部则在其内容性质上异于前者。理由是,若要实实在在地开拓一片陌生的领域,实证性研究便是必经之途。因此,对该部分的研究紧扣其性质而言,与其说是哲学成果,不如说是为之而作的预备性的、带有社会科学或政治哲学色彩的探索。冀望诸多学术先驱与同人以及后学不吝指正。

最后,值此机会,我要诚挚感谢德国本笃会(Benediktiner-Missionare, Muensterschwarzach)、富丽慈-泰森财团(Fritz-Thyssen-Stiftung e.V.)、康纳德阿德渥财团(Konrad-Adenauer-Stiftung)等诸机构连续不断赞助我在欧洲求学十年间所需的经济资源。同时也要向参与翻译工作的首尔大学哲学系博士班研究生(金在弦外4位)和不辞烦琐与辛劳的韩信大学哲学研究所林翼权君以及大路社编辑部诸位深表谢意。更难以忘怀的是从位于西柏林的普鲁士图书馆(Preussische Staatsbibliothek)影印众多的资料而不断提供给我的李钟秀兄以及将偌大的文章欣然通读并加以润色的权五龙(文学评论家)兄,我在此表达对他们两位深深的友情并致以诚挚的谢忱。

1986年5月19日于首尔南岷洞

宋荣培

目 录

导论	1
第一部 儒家思想的形成背景和本质	7
第一章 孔子前后时代的社会问题	8
一、西周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	8
二、西周时代的意识形态	11
三、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的变化与社会结构的根本转换	16
第二章 儒家思想的本质	23
一、孔子对当时社会结构变化的基本立场	23
二、孔子的社会伦理学说	31
三、对孔子社会伦理学说的批判理解	67
第二部 儒家式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	73
引言	74
第一章 西欧人的亚洲观	78
一、市民社会的亚洲观	78
二、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	80
第二章 儒家式社会的土地私有制生产关系论	89
一、对灌溉假说的否定	89
二、土地私有制的形成和“官僚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物质基础	102
三、论官僚-地主的支配体制并否定“东方式专制主义”说	111
四、“土地私有制生产关系”中“官僚-地主”的支配地位和作为社会变草原 动力的农民运动	137
五、中国儒家式社会结构论	167

第三章 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和欧洲中心主义之批判	169
第三部 儒家思想的破坏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187
引言	188
第一章 中国革命与儒家思想的破坏	189
一、儒教破坏运动的社会历史原因	190
二、“新中国”的理念和儒教的破坏	197
第二章 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的转换	222
一、鲁迅精神和奴性批判	225
二、李大钊的新“儒家”、新“道家”的世界观	238
三、郭沫若的《马克思进文庙》	255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毛泽东的革命论	265
一、毛泽东的中国革命论——对斯大林路线的否定和“新民主主义”论	267
二、作为马克思和毛泽东唯物辩证法根本范畴的“实践”	292
三、对毛泽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评价	323
四、结论——非市民社会中的人与革命	326
附录1 《中国社会思想史——儒家思想、儒家式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 化》概要	329
附录2 宋荣培《中国社会思想史——儒家思想、儒家式社会与马克思主义 的中国化》读后感	338
附录3 序	345
附录4 不断书写的中国思想史 ——韩国学者宋荣培教授所著《中国社会思想史》读后	348
附录5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驳马克思的中国观 ——读宋荣培教授的《中国社会思想史》	352
附录6 宋荣培《中国社会思想史——儒家思想、儒家式社会与马克思主义 的中国化》	356
本书涉及的文献	360

导 论

本书对众多中国古典作品进行了研究,并对现代中国和日本众多学者的研究进行了讨论,旨在对下面两种见解进行批判分析:其一是针对无视实际历史情况、片面规定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斯大林传统理论,对将中国历史图形化地分为五个阶段的中国历史学家与哲学家们公式化的历史著作进行了批判;其二是马克思的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范畴^①,即以欧洲中心主义为根据认识中国历史的普遍认识方式的批判,这种观点认为(在地理上的亚洲社会)尚未进入欧洲社会历史发展的初级阶段即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奴隶社会,更没有进入封建社会。在进行批判的讨论之后,结合 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期间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和革命实践中付出的努力,尽可能具体地讨论了中国革命中脱儒家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第一部中首先针对孔子社会理论的本质进行了批判研究。在这里,我的出发点是试图克服至今为止孔子理论(无论对它拥护还是批判)现有研究中存在着的根本缺陷。因此对忠实于中国文化传统的钱穆、初期的冯友兰等中国学者,以及后来(20 世纪 50 年代)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持相反意见的赵纪彬、杨荣国和晚年的冯友兰等进行了分析。前一类学者几乎都结合人本主义来拥护儒家思想的普遍适当性,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则从历史唯物论观点出发与前一类学者(所谓资产阶级中国学者)针锋相对,而且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将孔子批判为拥护伴随封建地主阶级的形成而必然落败的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思想家。

因此本研究首先仔细地讨论了属于前一类拥护儒家思想普遍适当性的中国学者的见解,然后阐明了由于在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是否存在有着疑问^②,而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学者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著述显得具有虚

① 参见本书第二部第一章。

② 关于作者否定中国古代社会中“奴隶制社会”存在的见解,参见本书第一部第二章。

构的特点。我认为,前一类资产阶级中国学者没有充分考虑到孔子及其后学思想形成时期的社会历史状况,只是抽象地对孔子理论进行了解释;另一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则仅仅将孔子理论解释为企图复兴衰落的奴隶制社会的意识形态。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1926年由批判历史学者顾颉刚^①提出来的,即为什么孔子的理论并非在其生存当时,而是在“奴隶制社会”的规定完全不适合的300年后,在汉初被确立为正式的国家理念(die offizielle Staatsdoktrin),并且从那时起到最近为止一直作为正统的政治理念(die orthodoxe Ideologie)的形式得以存在?本书欲阐明的问题在中国的文献中一直没有得到充分而有说服力的解释,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既无法对这一问题作出解答,也无法充分说明儒家思想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发展中所做贡献的重大意义。

为了克服这两种观点的缺陷,我在第一章中叙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根本性转变,即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周代所建立的封建宗法社会的崩溃。其后在第二章中结合孔子及其后学(孟子、荀子等)生存的古代中国社会的转换期,具体了解孔子社会伦理学说的根本思想。我认为,关于人与社会的理论只有在该理论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下才能被正确领会。因此为了了解儒家思想的本质,首先阐明了孔子对当时社会问题所取的立场(Einstellung),并从这种基本立场出发,对孔子的社会伦理进行了全面讨论。

在第二部中我尝试对中国传统社会(我称之为“儒家式社会”)^②进行了广泛而彻底的分析。我认为尤其在这方面,本书之所以有创意(heuristisch)是因为,我根据中国的古典(《史记》《汉书》《后汉书》)对“儒家式社会”进行分析,由此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理解提出了新的理论。在中国现代史上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在1928年中国共产党败给国民党之后开始抬头,并且在30年代初达到高潮。不仅马克思主义者,连(所谓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也参与了关于当时的中国社会究竟处于何种发展阶段这一政治上十分敏感的问题的争论。中国社会是否依旧处于封建阶段?资本主义因素是否已经充分发展得足以适合无产阶级革命?根据主张人类历史单一发展的马克思

① 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2卷。

② 中国历史是根据冯友兰的主张划分的,儒家式社会是与“经学时代”即正统的儒家思想在社会中居支配地位的历史阶段一致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香港,1961)。儒家式社会是随着西汉初武帝时代形成的以董仲舒等为代表的今文学派的倡导,儒家思想被规定为正式的国家理念而产生的,约两千年后,即19世纪末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的传入而灭亡。

主义(更准确地说,是斯大林图形化的公式)的解释,这些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的问题是在规定中国革命下一阶段任务中起着决定作用的问题。在这里,著名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共4卷,1931—1936,上海)的编者王礼锡指出,由于对儒家式社会的特点没有一致的看法,所以学界将儒家式社会的问题称为一个“谜”。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在50年代,又重新引发了根据马克思原理来说明中国历史发展的中国社会史,尤其是对土地所有形式的争论。在这一争论过程中,侯外庐接受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认为在古代中国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国家”是唯一的所有者。侯外庐、贺昌群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与历史学家为了强调中国皇帝的独裁性格,明确提出了国家的政治中心作用。对此,高敏等学者取了相反立场。但无论何种观点,中国大陆都单纯地将夏朝至春秋时期(前770—前476)归为奴隶社会,将战国时代(前475—前221)至鸦片战争(1840)约2500年的土地私有占支配地位的时代归为封建社会。18世纪以来,欧洲的思想家们(除孟德斯鸠外,还有英国的国民经济学家、黑格尔和马克思等)对于亚洲,更准确地说,是非欧洲的社会,全都只看到了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和政治上的东方专制主义。

根据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亚洲社会处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即半野蛮半文明阶段。这里没有土地私有制,只有部落的共同所有和东方的专制主义式的土地国有制,即万人服从于专制君主一人(或国家)的奴隶状态占据支配地位。这一学说作为理论论证最重要的前提,是以所谓的灌溉假说(die hydraulische Hypothese)为根据的。根据这一学说,大型的公共事业(建设堤坝、运河等)是使东方的农耕变为可能的基础,为了管理这种大型的事业,“专制君主”即“国家”这一组织化的权力是必需的。主张这种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有20年代和30年代的威特伏格(K. A. Wittfogel)、马加(Madjar)和沃格(Varga),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变为反共主义者的威特伏格和匈牙利的马克思主义者托凯(F. Tökei)等。此外还有很多研究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学者(Garaudy, 1967; Fahrle/Schöttler, 1969; Kramer, 1970; Vatankah, 1973; Vogel, 1974; Jutta-Reisse, 1975)也是从亚细亚生产方式论出发的。正如1978年门泽尔(U. Menzel)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国式发展模式的理论与实践》(Theorie und Praxis des chinesischen En-

twicklungsmodelles)中所说的,根据马克思和亚民(S.Amin)^①的理论,可以将中国传统社会归结为贡纳制的生产方式的亚洲形态(die asiatische Form der tributgebundenen Produktionsweise)。但在这两种理论中都假定了一个共同之处,即延续了数千年的中国社会的停滞性。这两种理论全都试图对这种停滞性提出几种根据,但是持这一观点的这两种理论都没有想过在儒家式社会里每隔200年就出现一次的革命群众对既有的权利秩序所做的彻底破坏,也没有把这种自我变化的巨大力量纳入理论视野,因此也无法对此作出任何说明。除了一部分中国和日本学者的成果(李亚农、杨宽、许倬云、增渊龙夫等)^②,到现在为止,在所有的文献,尤其是西方的文献中,几乎没有从社会经济关系出发,明确地阐述中国社会从西周宗法社会(或封建制)到汉代的官僚中央集权制发生的变动。正因为如此,主要依据欧洲中国学学者(尤其是巴拉兹E.Balaz)理论的弗兰克(H.Franke)和特拉泽太(R.Trauzettel)认为将汉代社会作为一个社会经济模式来定义是不可能的^③。我的儒家式社会理论与埃伯哈德(Wolfram Eberhard)提出的“绅士”(Gentry)社会^④的主题相近,但我将这一主题作了更加丰富而广泛的发展。

我的儒家式社会理论与前面简单提到过的、至今为止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各种理论相比较,首次根据具体的资料,尤其是中国的古典,阐明了皇权(或国家)和大官僚-地主之间的利害冲突与矛盾,而这一点在现在看来具有崭新的现实意义。我的分析不仅否定了灌溉假说和与之相关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假说,而且更进一步,证实了地主阶级的垄断式支配权,即证实了大地主在中央官僚集权政府占据高级官僚的地位,同时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破坏皇权(或国家)的官僚主义,最终促使中央国家(皇权)的阶级基础完全崩溃。与大官僚-地主的这种垄断支配相联系,我阐明了儒家式社会停滞的特点及其所具有破坏性的、革命性的巨大动力的结构性根源。最后记述了中国传统社会里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萌芽。上述理论,既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否定,也是对马克思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

在第三部“儒家思想的破坏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我讨论了非市

① U.Menzel, Theorie und Praxis des chinesischen Entwicklungsmodells, S.24.

② 李亚农:《李亚农史论集》,上海,1978;杨宽,《战国史》,上海,1980;Choyun Hsu, *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Stanford, 1965;增渊龙夫:《中国古代の社会と国家》,东京,1960。

③ H.Franke, R.Trauzettel, *Das chinesische Kaiserreich*, Fischer Weltgeschichte. Bd.19. S.95.

④ Wolfram Eberhard, *Conquerors and Rulers; 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

民社会的中国革命。为了了解中国革命,我具体地分析了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奋斗历程。革命知识分子不仅要通过外来文化将一般的革命理论消化为自己的东西,而且不得不完完全全地体会正在屈辱地倒塌下去的传统儒家社会。他们还要以无法从传统和现实中分离出去的语言、习惯和道德等为媒介,来探索并实现他们的革命之路。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主要谈了下面三个问题:

1. 新中国的理想和儒家思想的破坏。
2. 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3.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在特殊的中国社会状态下的适用。

尤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我只考察了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及其唯物辩证法。但本书的目标却是结合非市民社会的中国社会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解释儒家思想、传统的儒家式社会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同时阐明中国革命的本质。

